

退役军人罗旺彬连续9年担任广西钦州申安村驻村第一书记,两度被乡亲们联名挽留——

512个红指印:乡亲授他“军功章”

■刘德安

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

11月下旬,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草木依然葱茏。驱车前往陆屋镇申安村,成片的甘蔗林向远处延伸,空气中仿佛能闻到香甜的味道。

“你们先坐,我很快忙完……”走进申安村驻村第一书记罗旺彬的办公室,这位中等身材、两鬓略斑白的老兵,正在电脑前忙碌着。

“这段时间,村里正在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相关评估,工作量不小。”同行的灵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指着罗旺彬的电脑,小声对笔者说。

罗旺彬的电脑桌面图案,是满屏的红指印。这正是笔者前来的原因——在罗旺彬驻村的9年里,乡亲们两度联名按下红指印,向镇党委提出“要求罗旺彬同志继续留任申安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申请。

红指印,是中国农民质朴而坚决的表达。乡亲们为什么不不舍得罗旺彬离开?在挂满锦旗的办公室里,在郁郁葱葱的甘蔗林里,在乡亲们朴实无华的笑脸里,笔者寻找着答案。

“当过兵的人,要有兵的样子”

罗旺彬当兵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3年。这段经历,却深刻影响着他的生活。

1992年,罗旺彬从家乡灵山县参军入伍,成为武警四川总队一名战士。新训结束,平时话不多但办事沉稳的罗旺彬,被选中成为连队通信员。

有战友觉得,通信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上传下达,难有作为。罗旺彬并不认同:“这是很能锻炼人的岗位,关键要看你怎么干。”

准确、迅速地传达上级命令、指示,熟记有关单位的番号、代号,及时取送、分发报刊……回忆起当通信员的点点滴滴,罗旺彬滔滔不绝:“那段经历带给我收获主要有两个:一是勤快严谨,眼里要有活儿;二是明白一个道理,悬在空中容易飘飘然,多跑班排、钻进兵堆才有归属感。就像现在,我和乡亲们待在一起就觉得特别踏实。”

3年时光匆匆而过。1995年,罗旺彬退役回到老家,在灵山县税务局基层岗位一干就是21个年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2016年灵山县税务局选派干部到申安村驻村的消息,在罗旺彬平静的心湖里激起涟漪。

“以前来申安村,都不敢穿皮鞋来。”罗旺彬回忆,在县税务局工作的这些年,他多次到申安村开展税务工作。那时,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晴天一脸灰、雨天一脚泥,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老人守着薄田过日子。罗旺彬心里早就有一个念头:将来有机会,要为村里做点什么。

抱着这样朴素的想法,罗旺彬跟妻子商量,想去申安村驻村。不出所料,在灵山县其他乡镇工作多年的妻子,对他的想法非常支持。

2016年3月7日,40岁的罗旺彬带着行李到申安村报到。驻村第一天,他就干了一件事——把村委会办公用的几间平房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是村里的门面,也是一个老兵的脸面。不管干什么事,当过兵的人,要有兵的样子。”罗旺彬说。

“我心里有乡亲们,他们自然对我亲”

为尽快打开局面,罗旺彬起早贪黑入户走访,没想到连连碰壁。他把几位德高望重的村民请来,表明想为村里做点事的态度,希望得到支持。一位村民提醒他,要想让乡亲们掏心窝子,就得“走进”他们心里。原来,前几天入户走访时,“没想太多”的罗旺彬,穿了一身税务工作人员制服。因为这个原因,有村民觉得他“摆架子”,不亲近。

从此,那个有些“书生气”的机关干部不见了,石墩上、田埂边,多了一个皮肤晒得黝黑、走路脚底生风的“罗书记”。

罗旺彬把走访中发现的问题一个个记在本子上。“乡亲们各有各的难处,如果一家一户‘撒胡椒面’,是省事、简单,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继续进行更深入的调研,与村两委班子反复研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的工作思路逐渐清晰。

笔者随罗旺彬来到申安村糖料蔗种植基地。蔗农们熟练地砍蔗、削叶、捆绑,一辆辆运输甘蔗的卡车停在林边。

“申安村一直有种甘蔗的传统,但以前种植分散,销路一般。”走进甘蔗林深处,罗旺彬不时停下脚步,摸一摸、摇一摇甘蔗,“今年的产量、销路都不错。”

继续向前,笔者见到正戴着草帽弯腰砍甘蔗的村民施显周。他说,以前自家只有几亩甘蔗田,随着村里“甜蜜事

业”的发展壮大,他如今承包了80多亩甘蔗田,是村里的种植大户。

“这都是罗书记一步步带出来的。”施显周回忆,罗旺彬驻村没几个月,就提出发挥甘蔗种植传统优势,进一步做大甘蔗产业的想法。在罗旺彬牵头下,村里引进新品种糖料蔗,推进甘蔗“种、收、销、榨”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式”农业,破解村民没钱种、不懂种、卖不出的难题。与此同时,罗旺彬为争取修路资金“磨破了嘴皮子”,一条条平整的水泥路,如飘带般伸向甘蔗林深处。

2023年底,申安村成为灵山县种植甘蔗数量最多的村。沿着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前行,一路上遇到的村民们,亲热地和罗旺彬打着招呼。

“我心里有乡亲们,他们自然对我亲。”罗旺彬笑着说。

“乡亲们需要我,我就留下接着干”

2020年2月,罗旺彬的驻村任期将满。当时,他的父亲身体不太好,孩子也需要照顾,可看到那份按着申安村28名村民红指印、希望他留任的申请书,罗旺彬还是留了下来。几年后,在他又一个驻村任期将满之际,乡亲们再一次联名按下红指印,希望他继续留任。这一次,按下红指印的村民增加至512人。

“这些红指印,是乡亲们授予我的‘军功章’。”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罗旺彬满心感动,“乡亲们需要我,我就留下接着干。”

申安村村委会后面,一栋黄色的厂房引人注目。这是罗旺彬为村集体申请帮扶资金,与一家玩具厂合作共建的“就业帮扶车间”。村民黄春华和邝积连就在这里工作,他们都在留任申请书上按下了红指印。

笔者了解到,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又要照顾孩子,黄春华一度没机会去工作。罗旺彬介绍她到“就业帮扶车间”上班,既能补贴家用,又方便照顾孩子。

车间另一头,46岁的邝积连正在给玩具喷漆上色。邝积连没有妻子,父母去世后一度失去生活目标。在罗旺彬苦口婆心劝说下,邝积连终于答应到“就业帮扶车间”工作。“现在我的生活过得挺好。罗书记是一心为我们村好,我愿意听他的!”邝积连说。

采访期间,笔者发现,不管是在甘蔗林里,还是在“就业帮扶车间”,抑或是在村民广场,听说有人采访“罗书记”,乡亲们便热热闹闹地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讲起他们与罗旺彬的故事。

聆听乡亲们的讲述,笔者一次次想起被罗旺彬设置成电脑桌面的那张红指印照片——那一枚枚红指印,红得鲜艳,让人心暖。

那枚枚红指印,红得鲜艳,让人心暖。图1:罗旺彬(右三)和村民在一起。图2:罗旺彬(右)和村民一起种甘蔗。图3:罗旺彬(右)到村民家走访。图4:村民联名在希望罗旺彬留任的申请书上按下红指印。

受访者供图

代居住的地方,村民们虽能理解,情感上还是有些不舍。那段时间,范寿贵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泡”在村民家做工作,介绍遗址保护情况和安置点建设进度,收集村民的意见建议。范寿贵家的老房在莫角山脚下,其中有几间对外出租,收入不错,但他还是和几年前迁坟时一样,带头签了同意书。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不仅是家乡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咱们应该支持。”范寿贵总是这样对村民们说。

2019年7月6日,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一刻,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直播的范寿贵激动不已。“‘申遗’成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了,那种自豪感难以言表。”范寿贵说。

如今,距离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已过去5年,大观山村的大片区域被囊括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范围内。水草丰美、底蕴深厚、风景如画的公园,让村庄的“颜值”与内涵同步提升。随着当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

生活在“遗址第一村”,年过花甲的范寿贵常常主动参加遗址周边的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活动。“我虽然不再担任业余文保员,可始终卸不下守护古城的责任。我们要把家乡形象保持好,把良渚古城的故事讲好,让世界知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范寿贵说。



冬日,辽宁省沈阳市朔风凛冽。温暖的房间里,一位白发老人静静地坐靠在木椅上,翻看珍藏多年的老照片,给笔者讲着照片背后的故事。

老人名叫杨振国,是一位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得知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于11月28日回国,他不禁又想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往事,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你们看,这是我们当年在安东(今辽宁丹东)长甸上河口地区架设浮桥时的照片。”杨振国的目光,停留在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我们就是从这里跨过鸭绿江……”

1950年的一个秋日,时任东北军区工兵教导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的杨振国,被紧急通知参加全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工兵教导团停止原计划的教学活动,转为作战部队,做好参战准备。不久后,根据上级命令,工兵教导团迅速成立前线指挥所,来到位于鸭绿江畔的上河口地区执行浮桥架设任务。500余名官兵紧急集结,经铁路输送抵达任务一线。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浮桥架设训练中。”杨振国回忆,他们先是在岸边将船只分组连接起来,再一组一组推进水里,用长条木连成一长串并抛锚固定,最后把桥板平整地铺在长条木上。

当时架桥技术落后,船只分组连接时只能用绳索,官兵手上很快就磨出血泡。晚上架桥,没有照明设备,只能用马灯。秋日的鸭绿江虽未结冰,江水依然寒冷刺骨。杨振国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情景:前线指挥所拉来几箱高度白酒,官兵下水作业前挽起裤腿、解开上衣,拿起白酒往身上搓。水中作业的官兵1小时一轮换,上岸时浑身冻得发紫。经过休息,他们又继续往身上搓酒,而后再跳入江中。

虽然困难重重,官兵却苦中作乐,吹响“工兵工兵,开路先锋;攻坚克难,以苦为荣”的口号。担任前线指挥所政工组组长的杨振国,创作了“工兵战士逞英雄,鸭绿江上架浮桥。保证大军去援朝,歼灭敌人把国保”等战地诗歌,给官兵鼓舞士气。

经过几天的训练,工兵教导团接到首批入朝志愿军部队即将过江的命令。上级要求浮桥黄昏架,拂晓撤,架设时间限制在两个半小时,撤收时间为一个半小时。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就是我们工兵显身手的时候。”杨振国说,任务虽然艰巨,但官兵士气高昂,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1950年10月19日晚,架桥作业正式开始。一声令下,官兵纷纷跳入江中。迎着江风,大家前用绳拉,后靠人推,把一组组船只精准地输送到桥轴线上。接下来是铺桥板,每块桥板约有50公斤重,大家抬着,扛着桥板铺设,

鸭绿江上架浮桥

九十四岁抗美援朝老兵杨振国回忆军旅往事

■ 荣俊运 李禹墨

汗水和江水把衣服浸透。最终,浮桥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架通。

夜幕四合,江水滔滔。一支支志愿军部队及辐重源源不断从浮桥过江,踏上保家卫国的战场。部队过江时,杨振国在浮桥上负责引导保障。即使过去70多年,他始终忘不了许多战友走到岸桥头时的回头一望:“那是他们对祖国、对家乡的眷恋啊!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亲爱的战友,让我们战场上再相会!”

说话间,杨振国从相册中抽出另一张老照片,轻轻抚摸着说:“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志愿军官兵过江时我拍下的。”

1950年10月底,工兵教导团圆满完成浮桥架设任务,之后被改编为工兵22团。杨振国和战友们携带武器装备,从亲手架设的浮桥走过,继续在异国他乡开辟一条条前进的通道。

图1:工兵教导团官兵在江中进行架桥作业。

图2:志愿军官兵通过杨振国和战友们架设的浮桥,跨过鸭绿江。

受访者供图 本版制图:唐 硕

退役军人范寿贵30余年守护良渚古城遗址——

古城墙上的“哨兵”

■薛晓丹

一场冬雨过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瓶窑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片静谧。举目四望,大片的芦荻随风摇曳,水坝上草木青黄,一派苍凉景象。

漫步园中,规模宏大的城址、星罗棋布的遗址区、博物馆里精美的出土文物……无不展现着良渚古城的万千气象,书写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绵长。

“反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中心遗址,原来都属于我们大观山村的范围。”站在莫角山遗址的最高处,大观山村原治保主任、退役军人范寿贵挥动手臂,比划出一大片区域,“我们村目前已发现40多个遗址点,被称为‘遗址第一村’。”

这片土地,是范寿贵最熟悉、最热爱的地方。出生于1960年的范寿贵,是土生土长的大观山村人。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备荒挖防空洞,有时能从挖出的泥土里发现陶片或玉片。“那时候,村里还有生产大队,把挖出来的东西交到大队,会奖励一个茶杯或热水

瓶。我们当时并不太懂,只知道挖出这些东西交上去就对了。”范寿贵说。

1979年,范寿贵入伍来到武警某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施行。在部队组织的学习讨论中,范寿贵对“保护祖国文物人人有责”有了清晰的认识。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可是个大事。”范寿贵回忆,“特别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文物——玉琮王的发现,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脚下的这块土地这么了不起。”

也是在这一年,范寿贵从部队退役回乡,担任大观山村治保主任。当时浙江省出台相关政策,村里也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范寿贵响应号召加入文物保护队伍,成为良渚古城遗址第一批业余文保员。

业余文保员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对遗址保护区进行日常巡查和保护。地面有没有新冒出的违章建筑,新

修建的房屋高度有没有超出标准,甚至古城遗址一砖一瓦的位移,都在范寿贵的巡查范围内。

“良渚古城的文化层距离地表很近,有些地方只有30厘米,很容易遭到破坏。”范寿贵说,一到农忙季节或是村里有小修小建,他几乎每天都要绕着村子转上一大圈。巡查时,遇到个别村民“转不过弯来”,他就一遍遍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讲清“文物保护离不开群众支持”的道理,不厌其烦。

“葡萄畝遗址知道吗?出土了‘网红’文物‘小鳄鱼’宽把杯的遗址,那个位置之前是我家的藕塘。我们家原来在西城墙附近,我是在良渚古城墙上长大的……”范寿贵说,他这个老兵,就像古城墙上的哨兵一样,有责任带头把文化遗产守护好。

和范寿贵一样,出于遗址保护需要,大观山村的许多村民都曾面临搬迁。那一年,为配合良渚古城遗址“申遗”,不少村民要搬迁。要离开世代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军地联合开展“情暖老兵·听力关爱”公益活动,为听力障碍的老兵提供诊疗服务,并为符合条件的老兵捐赠助听器。 刘明奎摄